

PLURALISTIC
NARRATIVES

AND

多元叙事与 中原写作

刘 军 -----> 著

CENTRAL
PLAIN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WRITING

多元叙事与 中原写作

刘 军 著

I206.7
55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元叙事与中原写作/刘军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 - 7 - 5097 - 6921 - 8

I. ①多… II. ①刘… III. ①当代文学 - 文学创作研究 - 河南省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7627 号



多元叙事与中原写作

著 者 / 刘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张金勇 高明秀

责任编辑 / 张金勇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52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6921 - 8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PLURALISTIC
NARRATIVES

AND

CENTRAL
PLAINS

WRITING

序 言

耿占春*

无论是在教学实践还是在批评写作中，刘军都一直保持着对文学的热情，在今天的学院人中，刘军不免显得有些另类，他在某种程度上传承了20世纪80年代那种有活力的批评风格，不仅大量阅读文学作品，还尽可能与所评论的作家保持着接触和传记经验式的理解。在他的每一篇批评文章中尽力体现出这种风格，无论是对中原乡土叙事的研究，还是他一直追踪的当代散文批评，刘军都从对作品的阅读感受出发，对之进行携带着热情与主观性契机的阐释。

今天学院式的文学研究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之间一个明显的差异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兴趣转向了文学史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这种研究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对文献的掌握上。一个研究者围绕着主题要尽可能完备地拥有相关资料，比如掌握考订一部作品的版本、各种阐释与评论文献乃至传记材料，但有时却会忽略对这部作品的阅读。极可能一个研究者阅读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文献，却不去直接阅读所研究的作品本身。当然，在文学史的研究中，由于关注的对象是史的线索、史的脉络与顿挫而非具体作品的阐释与评价，将文学作品置于间接地位似乎也无厚非。与之相似，在“理论”的研究中，一部作品可能会成为某种通常是舶来理论的一个注释，文学作品与文学

* 耿占春，1957年生，河南柘城人，文学评论家。

经验同样被置于次要位置。就此而言，刘军的批评文章之所以能够得到作家们较高的评价，主要缘于被评论对象从他那里能够感受到批评者认真细致地阅读了他所批评的文本。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史研究模式与理论研究模式之所以为学院人所普遍认可，其主要原因是学术或学科上的考虑。比起不能不使用阅读经验、鉴赏力与主观感受的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与理论研究都可能较为容易地获得知识论的面貌，获得学科与专业上的客观性面貌。但研究者通常会忽略这一事实：文学不仅涉及知识与认知，而且人文学科的认知方式与洞见往往包含着知识主体的主观性契机。对知识客观性的强调、对人文学科研究中的主观性与知识主体的排斥，并非出于深刻的认识论动机而保持的学风的客观性。对照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功能的丧失这一后果来看，学风的客观性面貌并非人文学领域的固有特质，在某种意义上倒可以说是知识主体的软弱、认知伦理的缺失与思想的匮乏所致。就像章学诚批评清儒“辄以有益后人考订为辞”“与其过而废之，宁过而立之”的文献主义时所说的：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中）》〕在 18 世纪考证学的知识集团及其学术氛围中，章学诚坚持将学术认知置于知识主体的主观契机之中，并力图恢复被考证学所忽略的“功力”背后知识主体的“天性”与“至情”在知识论中的地位。作为中国近代知识论范式的奠基者，章学诚当然注意到了所谓学风的客观化背后的社会语境的作用，注意到学人的天性与至情或知识主体所面临的利益诱惑与风险的规避策略：自四库馆开，寒士多以校书谋生。而学问之途，乃出一种贪多务博而胸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章学诚：《丙辰札记》）在文字狱大兴的恐惧氛围中，校书或搜集逸书自然显得安全些，但遗憾的是，腐儒们将策略当作了唯一重要的知识模式：盖逐于时趋，而误以褻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中）》〕显然，在章学诚看来，清儒高估了以褻绩补苴方式谋生的学术价值，他针对这一“填书塞

典”“字字有来处”的考索之风提出了富有知识论意义的批评。

出于对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学院人及其知识范式对知识主体的弱化，也出于在这种学术标准之中如何看待刘军这样的文学批评范式与话语风格，强调一下知识主体中的天性与性情或许是有益的。从一种知识传统来看，不管是考证之学也好，义理之学也罢，还是辞章之学，作为学术驱动的、引导一种知识活动的，往往是一个知识主体的主观契机。简言之，天性与至情既可能是一个学者进行学术探究的驱动力，也可能成为一种思想与话语方式的契机。基于上述问题，章学诚曾由此发展出两种知性类型或知识主体的辨认：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沉潜者循度数而徐达。〔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下）》〕两种知性类型的差异源自知识主体的差异，所谓的高明是一种直观、直觉与综合的知性主体，沉潜则表现为分析的、分解的和循序渐进的知性主体。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察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中）》〕章学诚对知识的主观性契机及其不同知性主体的区分预示着一种新的知识论，但无论是高明还是沉潜，无论是凭借直觉“独断”还是崇尚分析考察，无论是切求还是徐达，都是为追求一种“诚然之知”，远离“似是而非”之知。

由此来看，对文学的热爱、对文学经验与表达的敏感和褒贬分明几近刘军的天性，他也时常在阅读文学作品之时或慨然心会，或歌之泣之，有时竟忍不住深夜打电话给友人或作家本人表达其阅读感受，他在一些批评文字中时有某些阅读情境的再现，说刘军是一个至情的人亦不为过。当然，比起刘军的几位在学界已经卓有成就的同学如武新军、孟庆澍来，刘军显然需要通过“道问学”的“功力”对其文学“天性”“至情”进行补充、扩展、丰富，还需要在辞章的进一步锤炼之外，借重更完备的文献，发展出更复杂的理论思辨力，以免陷于朱子所批评的“有美质而未学者也”的境地。写下这些话，与刘军共勉。

目 录

序 言	001
第一章 新世纪河南小说研究	001
一 乡土叙事的两个向度	003
二 启蒙叙事与新文学传统	017
三 先锋叙事：落潮后的坚持	039
四 信史叙事与中原文统	065
五 小叙事与女性经验的内生长	082
六 女性视角下的心理场域	094
第二章 中原散文群落研究	104
一 省会散文群落	105
二 南阳散文群落	122
三 根亲文化视野下的《三炷香》	130
第三章 新散文与文体探索	137
一 新散文的缘起	142
二 跨文体写作范式与散文的长度	148
三 虚构性、叙事性、并置性结构	162
四 个体性诗性话语	179
五 新散文文本考察	190

第四章 散文批评与理论建设 206

一 新散文：危险的先锋性 206

二 当下散文的困局 214

三 散文新观察 219

索 引 236

参考文献 239

后 记 245

Contents

Preface	/ 001
Chapter 1 The Research of He Nan Novels in the New Century	/ 001
1.1 Two Orientations of Rural-color Narrative	/ 003
1.2 Enlightening Narrative and Literature Convention	/ 017
1.3 Vanguard Narrative: Persistence Behind the Decline	/ 039
1.4 History Narrative and Traditions of Central Plains	/ 065
1.5 Tiny Narrative and Femina Innerside Growth	/ 082
1.6 Psychological Field under Femina Angle of Vision	/ 094
Chapter 2 Research on Prose Writing Colonies in Central Plains	/ 104
2.1 Colonies in the Capital of Henan	/ 105
2.2 Colonies in Nanyang City	/ 122
2.3 Three Sticks of Incense Behind Root Seeking Culture	/ 130
Chapter 3 New Prose and Stylistic Exploration	/ 137
3.1 The Origin of New Prose	/ 142
3.2 Cross-style Writing and Length of a Prose	/ 148

3.3	Fiction, Narration and Juxtapositional Structure	/ 162
3.4	Personal and Poetic Utterance	/ 179
3.5	Textual Investigation to New Prose	/ 190
Chapter 4	Prose Criticism and Theory Construction	/ 206
4.1	New Prose: Vanguard in Danger	/ 206
4.2	Limitations of Contemporary Prose Writing	/ 214
4.3	Examination of New Prose	/ 219
Index		/ 236
Bibliography		/ 239
Postscript		/ 245

第一章

新世纪河南小说研究

20 世纪末，中原作家群的崛起与文学陕军东征一道，共同构筑了当代文坛之盛事。进入新世纪，活跃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批中原作家成为河南文坛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一批青年作家也开始崭露头角，其创作风格和题材愈发趋于多样化。中原作家群不仅活跃在河南本土，而且辐射力投送到全国范围，形成一个域外中原写作的群体。至此，中原作家群以其健全的梯队、宏阔的活动空间和广泛的影响力，为全国文坛所关注和认可。文学豫军在小说方面取得的成绩无疑是巨大的，由此奠定了河南作为小说大省的地位。这其中有两个标志性事件：其一是 2009 年在河南省文学院举办的“文学豫军签约新浪”仪式上，33 位河南作家集体亮相，签约新浪读书；其二是 2010 年“坚守与突破——2010 中原作家群论坛”在郑州举行，以作协主席铁凝和作协创研部的众多批评家为代表，对河南小说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评价。

进入新世纪以来，相关河南小说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主题学、价值学、文化学层面，即对乡土性、现代性的发掘上，研究形式则以文本解读或作家作品专题研究为主。以何向阳、刘海燕、刘宏志、黄轶为代表的许多评论家对涌现出的新作品或河南小说界新人，给予了跟踪式的研究和解读。目前看来，涉及新世纪以来河南小说叙事模式的专项研究，则比较欠缺。2002 年，河南本土著名评论家孙荪先生在《文学豫军论》（刊于《河南大学学报》2002 年第 4

期)中曾以很小的篇幅涉及河南小说的叙事模式问题,但篇幅太小,不足以弥补河南小说研究对小说叙事模式研究不足的缺憾。2006年,上海的新锐批评家李丹梦出版了学术专著《“文学豫军”的主体精神图像:关于农民叙事伦理学的探讨》。这本书基于乡土中国的叙事伦理,梳理文学豫军的整体文学创作,与叙事模式研究看上去相近,实则有很大距离。时至今日,河南小说的叙事模式问题仍未得到有效梳理。鉴于叙事学在当代文学语境中的勃兴,这种情况与河南作为小说大省的地位极不相符。

河南小说作家群体在思维方法、写作方式、艺术处理等因素上的差异是巨大的,而叙事模式的不同则是外显的因素。中原文化历时悠久,无论是文化底蕴还是文学底蕴皆是丰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河南小说的特性是当代中国小说的缩小版,新世纪河南小说叙事模式的几个转向,也是乡土性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当下中国语境中纠结、缠绕的典型表现,具备出色的观照意义。

这里提及的叙事模式,并非指现代叙事学框架下叙述视角、叙述事件、结构功能的具体研究方法,而是指从作品题材、价值判断、审美趋向出发,指向作家作品叙事话语的生成模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文学豫军的崛起是当代文坛的一个重要事件。具体到河南小说创作群体,其创作风格各异,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其呈现在叙事模式因素上,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一是乡土叙事模式,代表作家有李佩甫、老张斌、郑彦英等。其中,李佩甫树立的“神性写作”模式,传达出对绵延千年的乡土世界的敬畏;老张斌小说确立的抒情小说范式,则是借助记忆性书写,发掘乡土世界中爱与美的因素。二是启蒙叙事模式,这一模式既继承了五四小说的杰出传统,又紧跟时代的步伐,融汇西方和拉美的文学经验,总体上呈现出更加开放的特性。这一叙事模式涉及的作家众多,既包括像田中禾这样的老作家,又包括像乔叶、邵丽、李洱、傅爱毛这样的中青一代的佼佼者。如果再放宽一些视野,域外的河南作家,如阎连科、周大新等,整体话语风格亦趋于启蒙叙事模式。他们的作品,整体上皆表达出现代性的欲求。固然,现代性在各个作家那里,理解各有差异,不过他们对古老乡土世界的审视和批判却是一致的。三是先锋叙事模式,代表作家有

墨白、行者。这种叙事模式,表现在文体上,包括跨文体融合、叙事形式、推进叙事进程的手段、叙述声音的多重性;在欲望主题的处理方面,改变了欲望撕裂、异化主体的单向度呈现模式,转向欲望与主体间多重图式的面貌呈现。他们的写作,注重内心自由与形式美学的契合,也为中原文坛的多元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四是信史叙事模式,代表作家有二月河、程韬光、高有鹏。这类作品摆脱了对原生态历史的依附,不再把表现外在历史事件作为目标,而是侧重于内在地把握历史人物的思想精神、文化人格和情感欲望。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程韬光的“大唐三部曲”,高有鹏的《清明上河图》皆是从严谨的史料出发,从细部入手,去除掉那些在历史因袭中形成的符号内容,准确还原人物生活经历的具体语境,并深入他们的灵魂深处,以文学的想象力重构其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一 乡土叙事的两个向度

(一) 老张斌小说:抒情小说文统的接续

记忆对于小说家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写作资源,但如何处置自我的“记忆”,在不同的作家那里却有分野。福克纳宣称,“我现在不存在,我过去存在”。而普鲁斯特对于记忆比之更具深情,他是位活在记忆中的作家,写作与记忆的关系,在他那里不是水与冰的关系,而是水与水的关系,准确地讲是江水与海水的关系,以自我的记忆冲刷人类的记忆,从而成为一种显明。普鲁斯特不仅依靠记忆来写作,他的写作本身就是记忆的重要形式,概而言之,他是位将“记忆性写作”推向极端的作家。而米兰·昆德拉,这位以“存在”为写作母题的作家,则通过大量的作品揭示了“记忆”本身的悖论——越是深刻的记忆就意味着越是深刻的遗忘——消解了“记忆”的可靠性,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起与覆盖,真伪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的取消,文学书写的中心主题由传统的历史、时间、记忆逐渐转向对“现象”的关注,即转向对身体和欲望的文学处理。这就仿佛一列呼啸而过的火

车，诸多传统的写作模式在它的冲击下大多被迎面撞碎，飘落到两边的沟沟坎坎之中。在消解、拼贴、碎片化处理日益彰显的文学生态下，重视整体与和谐的记忆性写作模式被迫后撤，退入文学的边缘地带而存身。幸而时尚与流行并非考量杰出作品的标准，或者如评论家吴亮所言，“以思想为乐的人始终处在时尚的边缘，他们逃避时间的侵扰就是为了保持精神的纯粹性”，这句话几乎可视为老张斌及其小说写作的完美注脚。

翻阅老张斌的作品，无论其中篇小说集《蔷薇花瓣儿》，还是长篇小说《小艳史》《一岁等于一生》，自我的心灵经验与记忆如陈年的酒香，从纸页间缓缓流泻而出，濡湿了一地的月光。他的写作是记忆性的，也是内向性的，在他的作品中，读者几乎找不到对宏阔外在世界社会学性质的思考与判断，唯有个体情感记忆被准确而真实地再现，如原野上纵横交织的阡陌。白话文学兴起以来，有许多作家的作品涉及对自我记忆的处置，自我记忆与写作之间或许存在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不过在他们那里，自我记忆更多地承担提供写作素材的功能，如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长满不同的枝杈，这些枝杈上分别被刻上乡情、忆旧、风物、心理经验等符号。而在老张斌这里，这棵树木几乎没有分叉，只有自我的情感经验这唯独的一根树枝朝上生长，这种充溢着个体体温而且是单向性的记忆写作模式，让我想起作家乌尔法特说过的一句话：“我的杯子很小，我只用自己的杯子喝水。”也因此，就记忆写作的纯粹性来说，老张斌是最像普鲁斯特的中国作家。

记忆性写作在其本质上建构出的是一种关于时间的哲学，意欲在时间的深井里打捞出一桶桶清水，浇灌自己，成就一个清凉的世界，以此证实自我存在的真实与重量。换一个通俗的说法，即在玄远而无垠的时间通道里，凸显渺小而卑微的我们曾真实地活过，爱过，如此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记忆性写作与时间之间，体现出的是以柔克刚的关系。因为坚持记忆性写作的纯粹性，这也决定了老张斌小说柔情的纯度，或者说是其小说抒情性的深度与纯度。

抒情小说作为一个风格范畴，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来说，并不陌生。按照这个路数写作的有三个重要的小说家——沈从文、孙犁、汪曾祺。沈先生的小说写作集中于现代时期，而孙犁则横跨解放区文学与十七年文学，至于汪曾祺

先生，其创作高峰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其实在这个榜单里，还应该加入老张斌这个名字，与诸多老作家一样，他的创作虽然以新时期为缘起，但其重要作品，如上所述的三部作品，皆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以沈从文小说为源头，中经孙犁，再到汪曾祺，延续至老张斌，即可见抒情小说这一文脉在百年文学史上相对完整的流变与蜿蜒。因为重视人性美的发现以及情感的纯净度，这四位作家在文体上皆取得极高的成就。不过，就抒情小说这一文脉来说，他们却分取各自的向度。就沈从文来说，这位来自湘西总是以“乡下人”自居的作家，其作品总保留着自然的原野气息，主题开掘朝向素朴的人生经验以及人性美的发掘，语言自然清新，与叙事内容浑然一体。新时期文学以来，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得到重新发现，并迅速推高，被推举为现代文学的一座高峰。作家李锐将沈从文及其作品誉为“现代性大门开启后最后一缕诗魂”，从此评语中可见抒情小说曾达到的高度。汪曾祺师从沈从文先生，两者的创作存在着显明的承继关系，他的高邮故乡系列小说、散文，继承了沈先生的醇厚朴实，又在此基础上注入东方文人式的典雅情趣。在主题学层面上，与沈先生重视人性美的发掘有所差异的是，汪先生的作品转向了对人情美、人伦之美的开掘。而在艺术层面，汪曾祺先生对于抒情的节制保持高度的自觉，并将音乐性引入小说语言之中，形成散文化的小说形式。

孙犁的抒情小说创作有一个基本的视域，即严酷极端的战争环境始终作为一个硬度而存在。尽管有人性美的因素极力淡化这一硬度，然而并未完全取消。他笔下的人性美与沈从文笔下自然的人性美也有很大的不同，所歌唱的是战争环境中的亲情之美、同志之谊的婉转悠扬。总的来说，孙犁的小说并没有完全疏离时代的特殊性，只是基于作家的才情，对时代性做出了有效的修正。

老张斌的小说接续了抒情小说的传统，但在具体的抒情路径上，却开拓出与前辈不同的道路，从而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内在蕴涵——爱与美的透彻与澄明、亲历而来的绝对真实感、乡情叙事的温婉、语言的诗性葱茏。

先说爱与美的主题开掘力度。沈从文在叙及他自己的写作道路时曾说过：“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庙供奉的是‘人性’。”老张斌同样也是极力营造着这样一个“希腊小庙”，不过，这座小庙里安放的不是沈从文笔下色彩斑斓的

人性，而是爱与美本身。爱与美不仅是人类共同的心灵经验，也是人类文学艺术创造的恒定主题——希腊的文学艺术几乎皆是围绕这一恒定主题而展开，而在中国文学的源头《诗经》那里，对爱与美的歌咏也同样炽热而痴狂。进入现代性语境后，爱与美在文学艺术中的表现进入了一个曲折的通道，如鲁迅的作品，其深沉的大爱却以“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以无情地剖析（他人和自我）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老张斌的笔下，我们极少发现外在的现代性的缠绕，其作品中的爱与美因素基本以直呈的形式道出，形成强烈的阅读冲击力。在处理纯情之际，也不像当下流行的耽美小说那般，设置一个真空的场域，注入自我过多的假想与自恋，而是从本真的心灵经验出发，通过诗性的观照，去除社会学的先入之见以及那些多余的人生杂质，使情与爱的因素走向“敞开”，恰如海德格尔的判断——存在的敞开即为美。在《蔷薇花瓣儿》这部集子中，爱与美如同两根互相附着的藤蔓，并最终合二为一。透明、干净、澄澈、无言之美，这几个词语很好地形容了笔者的阅读感受。尤其是集子中的中篇小说《蔷薇花瓣儿》，涉及作家的初恋经历，每一个画面，每一个片断，如清水濯洗过的眸子，那么纯真，那么明亮——那种让人忧伤的明亮。小说中那个叫“改”的女孩，十六岁那年意图通过封锁亲近“革命”，却死于机枪射出的枪弹，长眠于村边的一处荒冢之中，一朵唯美的生命之花由此永远定格在青春的年龄。“改”虽然离去了，但一泓清泉却在人心中永远生根，这让笔者立刻想到沈从文式的命题：凡美丽的必定愁人。虽然这个篇章里有生离死别，有“我”到北京后的各种屈辱，但美的质素却拔地而起，自成大树。它不像周作人先生所写的散文作品《初恋》，文字中传达出过多的阴冷色调；也不像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半生缘》等作品，炽烈的程度足够，却有丝丝的荒寒落定在情感的底子之上。汪曾祺在《受戒》里将少男少女的青涩之恋、懵懂之情刻画得极为逼真。《蔷薇花瓣儿》写的也是少男少女的相恋主题，但内蕴的味道则更像曹雪芹书写的情愁意长，生发出的是诗意，是月光般的品格。合上这部中篇小说集，有两个念头在笔者的内心盘旋。其一，这部小说冲击和改变了我的个人情爱观。在此之前，笔者基本上是个爱情虚无主义的信奉者，或许是那些攻击性、占有欲、自私特性、虚荣心等负面因素过多的包围，使得我